



儿时过年盼新衣

安徽合肥 钟玉昆

现在过年，孩子们再也不为能否穿上新衣而发愁。可在我小时候，过年如果能穿上一件新衣是何等高兴的事啊！

母亲18岁时就学会了裁缝手艺，后来又成为我父亲的师傅。20世纪50年代末，父亲在六安一中上高中，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。由于历史原因，父亲高考成绩虽好，却未能上重点大学，最后补录上了安农院北分校（即现在的安徽农业技术师范学院）。一年多后，学校停办。父亲又回到农村老家，不久与母亲结婚了。为了生存，父亲只好试着用缝纫机缝制简单的衣服。父亲是半道学艺，为提高裁剪水平，每次去县城都买回来很多缝纫类书籍，一有空就在硬纸板上临摹、画线……很快手艺就超过了母亲。

在农村，裁缝多为女人。男人做裁缝是被别人瞧不起的。父亲由一个大学生一下沦落成小裁缝，开始难以适应，特别是一想到自己同学大学毕业后都有了工作，更是伤感。这时，父亲就会借助二胡或笛子或口琴一解心中的郁闷。那时虽然我还小，总感到音乐声中充满凄婉、悲伤。

20世纪60、70年代，自家做手工活包括做缝纫都是不允许的。父母白天在生产队干活，晚上又悄悄地拉上窗帘，偷偷摸摸地做缝纫的活。但隐蔽得再严密，时间一长，终有被村民发现的时候。为此，父母少不了挨生产队的批评。好在父母做人恭谦待人又好，生产队队长也能体谅到我们家庭的困境，慢慢地放松了“管制”，对父母亲做手工活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。

随着父亲手艺日益精进，他成了方圆几十里的高师。手艺好，自然生意就好。特别是春节时，衣服更是做不完，每天加工到深夜。我们兄妹几人也帮着父母做下手，订扣、网扣眼、操裤脚边、熨衣服，我们全会。当时最难做的活是用布条缝制老式对襟褂的布纽扣。缝条、打结扣太复杂，在父母的示范下，我们慢慢都学会了。熨衣服是件难活，父母自然就把这活落到老大我的头上。那时家里没有电，更没有电熨斗。熨衣服的熨斗是用生铁铸成的，又笨又重，里面要烧木炭才能产生温度。每次引火、烧炭，都要捣鼓好半天，常常弄得我一

鼻子灰。熨斗里的炭是烧着了，可熨斗的温度实在难把控，稍不注意就把“的确良”衣服熨通了。为此，我头上少不了挨父亲的尺板，一边是我的泪水，一边是爸爸的懊恼：“今天的活算白忙了，又得赔人家新衣服。”

时间在一针一线中流逝。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时间，我们就掐指算计着，什么时候父母也给我做一件新衣。有时还以“罢工”相要挟，为此，我这个领头的老大没少挨尺子。父亲怒斥道：“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，穿新衣也得先让人家的孩子，你们的新衣啥时候不能做！”一听此话，我的眼水直打转，内心是多么渴望过年时有一件自己的新衣啊！

每年大年三十上午，别人家都开始贴对联了，可我们家里常常还有几个小孩在大人的带领下还在等新衣。父母和我们全都紧张地忙碌着，直到最后一名小孩穿上新衣，我们才如释重负。人家孩子的衣服做好了，现在该轮到做我们的新衣了吧。父母看到我们期盼的目光，马上又俯下身子，动手为我们兄弟姐妹每人缝制一件新衣，这时，也许是我们兄妹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候！此刻，我们兄妹拿出全部看家的本领，很快就把各自的新衣扣眼操好，订上纽扣，迫不及待地穿上新衣，在院子里欢快地跳着、蹦着，比试着谁的衣服更合身、更好看……

看到孩子们的高兴劲儿，原本满面倦容的父母如沐春风。直到这时，父亲才大声说：快拿笔墨来！其实我早已准备好写春联的纸笔。只见父亲拿起久违的毛笔，略思片刻，在洒有金粉的红纸上唰唰地写上：“妙手裁云锦，精心剪春光”。此刻，四周满是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了。



编外“政治指导员”

安徽合肥 金婧

不久前，收到一张印有“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优待证”字样，含个人信息红色的证件卡片。我心潮澎湃，久久不能平静。卡片虽小，却是国家给每名退役军人最高的荣誉，是全社会对每名退役军人最大的褒奖；同时也承载着退役军人情系天下的家国情怀。

2005年12月，我从家乡合肥的一所高校应征入伍，来到远隔千山万水湘江的一座武警兵营里当兵。刚一入伍，我就被挑选到部队广播站里当播音员。说是播音员，但广播站就几个人，白天参加训练，到三餐吃饭时间，就得去广播站里开始广播。

在部队，广播站堪称“半个政治指导员”。为了不愧于这一称号，我们采、编、播一肩挑。天天超负荷运转，及时准确播送部队涌现的新气象、新风尚，官兵的新面貌、新动态……入伍刚一个多月，我们新兵就迎来在部队的第一个新春佳节。这时我们“不爱红装爱武装”的女兵连绝大多数新战友思想都出现波动，有的白天训练，晚上就躲在被窝悄悄哭鼻子；有的捧上家书，呆呆看大半天缓不过神来……

俗话说得好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战友们真情流露，我也有同样的感受。我及时把大家这一思想苗头收集起来，并针对战友们思想上出现的新动向、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对症下药。我深入到战友中间征集几封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的“鸿雁”，尤其是一些父母写得溢满浓郁情感色彩、鼓励子女安心服役的“家书”，进行一一播送。在此基础上，还邀请几位老班长“做客”我主持的节目，请他们现身说法，畅谈自己是在部队过好第一个春节的真情实感……

没想到这些“家书”和现身说法一播出，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许多新战友一听到父母亲切的教诲与嘱托，老班长真挚的感悟与回忆，深受感动和教育，很快就打消了想家恋家的念头，稳定了思想情绪，又以饱满

的热情，投入到苦练军事本领，投入到“我为祖国”站岗放哨之中。

我们女兵连的政治指导员感慨地对我说：“战士‘家书’一播出，那可顶我苦口婆心上的几堂政治教育课。”部队政治机关的首长一见到我，也是一个劲地夸赞，说我把一个小小的广播站，办成了一个做好战士思想政治工作的“大阵”地。并用一种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：“广播站只是‘半个政治指导员’，而你却是一个编外‘政治指导员’！”

此后，这编外“政治指导员”的雅称，就在战友中广泛传开了。

起初我并不懂啥叫“政治指导员”，只知道“指导员”在部队是专门负责做好官兵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工干部，也不知啥叫思想政治工作，更不会做思想政治工作。只要首长一称赞，我要么涨红着脸，傻傻一笑，就应付过去了；要么就说：“我只是把大家的心声，真实地反映出来。”首长告诉我，这就叫思想政治工作。要做战士思想政治工作，不光是上好政治思想课。大道理要讲，小道理也要讲，而且还要讲好、讲深、讲透、讲到官兵的心坎上。只有从小处着眼，及时发现官兵的“活”思想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因势利导、有的放矢。这样才更贴近群众，贴近官兵，贴近实际，更具有指导性、针对性、有效性，更具有说服力、感染力。

时光似箭，转眼间我已退役十多年，现在手捧共和国颁发的“优待证”，心情格外激动，那编外“政治指导员”的赞誉与褒奖，仿佛就在眼前……

炆蛋

安徽合肥 吴中伟

“不吃炆蛋，不算过年！”老人家爱吃炆蛋，很早就有这样的习俗。清代姚兴泉在《龙眼杂忆》中写道：“桐城好，祀祖清晨兴。欢喜团堆春果盒，金银花灿上元灯。炆蛋热腾腾。”炆蛋是家家户户最便于制作的美食之一，端一盘热气腾腾的炆蛋待客，也是饭桌上最常见的风景。

一般在年三十晚上，主妇们便开始忙碌张罗着。乡村不缺鸡鸭鹅等家禽，在鸡窝里取新鲜、个头大小均匀的鸡蛋用水洗净，先是在铁锅里加上大半锅水，将鸡蛋一个个从锅沿滑入，防止碰撞、破损，用小火慢慢煮，以免火势太大，鸡蛋炸裂。再将煮熟后的鸡蛋捞起来放在盛冷水的盆里浸泡一会儿，便于剥壳；也有将蛋壳细细敲碎的，便于吸收卤汁。有带壳炆的，也有剥壳炆的。最好将鸡蛋放入瓦罐里，配上少许盐、陈茶叶、八角、桂皮、酱油、香叶等，加温水后，小火炆煮。火苗欢快地跳跃着，舔舐着罐底，鸡蛋在浓汤里上下浮动，唱着歌儿，直至颜色渐渐加深，变成深褐色。香味从厨房飘逸出来，氤氲在空气中，在鼻翼尖久久萦绕着。

每一枚鸡蛋在炆火慢煮中都形成了自己的纹路、秉性、气度，那么的似曾相识，又是那么的与众不同。我还是喜欢带壳炆的，剥开外壳，光润如玉、形态各异的纹理，像极了纷繁复杂的人生。通常，我会先吸吮蛋壳里的卤汁，手指、口津顿时生香。那时没有成品的卤料包，各种配料的选用、配比、分量的多少都靠主妇们自己拿捏，因此炆蛋的味道自然也就千差万别，各有千秋了。正月初一，先到二爷家拜年，再去大伯家。一桌子茶点、瓜子、糖果。炆蛋成了主角，我们都叫“元宝”，摆在方桌正中央。大人们吃了，发财；孩子们吃了，学习进步。炆蛋拿在手里，日子便充盈起来，五香十色，符合人们追求圆满、渴望招财进宝的愿望。最喜欢吃的是蛋白，咸津津、香喷喷的，比平时过生日，母亲煮的清水鸡蛋好吃得多，蛋黄吃了两三个之后，便不想再吃了，于是偷偷地丢在一边。父亲总是忙不迭地拾起，放在自己碗里，朝我瞪着眼。现在想来，在当时并不富裕的乡村，浪费着实让人心疼。

正月初三初四，拜年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走亲戚一上午要跑好几家，赶趟儿似的，有的不在吃中饭，就是“鸡汤下挂面”也很仓促，便热好炆蛋，泡上一杯浓茶吃将起来。那个年代零食少，炆蛋不仅解馋，还管饿。乡村人好客，非要吃上几个热炆蛋，喝上几口香茶才行，不然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。大家一年到头，都是各忙各的，也只有正月里才能碰面、叙叙旧。

后来，在天城中学读书时，炆蛋外加一块卤干子才5毛钱，总要卖菜的大姐舀上一勺子卤汤。回想起来，真香啊！味蕾还泛着鲜美呢！

现在成品的卤鸡蛋，一个个被精致地密封包装起来，堆放在超市的食品角落。早点摊的炆蛋总觉得煮得不够入味，要么摆放时间太长，散渣渣的，少了入口的滑嫩。

一大早，母亲就在厨房忙活起来，热炆蛋、摆茶点、下挂面。闻着熟悉的香味，年——还是记忆中的模样……

